

从“义乌淘宝班”到“紫金众创小镇”

——浙江“汇融式创业教育”演进¹

严毛新 厉飞芹

【内容提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创业氛围浓厚，业已出现了包括“义乌淘宝班”、“紫金众创小镇”在内的大量创业教育的原生式典型案例，并在二十年发展历程中呈现“汇融式创业教育”的本土发展特色。本文以1999年—2018年为时间序列，以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自组织理论，对浙江省创业教育的演进过程和规律总结如下：近二十年来，浙江创业教育呈现多元主体渐次参与、多类关系渐次形成、多重网络渐次构建的演进特征；因创业市场中创业教育要素的短缺、社会对高校创业教育应更为实用的诉求以及各级行政部门在创业政策衔接与落地方面的需要诱致“汇融式创业教育”的形成；从演进趋势看，“汇融式创业教育”需要“去中心”主体架构的针对性培育，“并行式”协同结构的互通性完善和“共享型”服务平台的开放性建设。

【关键词】汇融式创业教育 渐次汇入 需求诱致 融合共振 浙江案例

2009年，义乌工商学院开办“义乌淘宝班”，大胆让在校学生边读书边“网上做生意”，尝试在部分学生中实行“上大学=开淘宝”培养模式，淘宝网店信誉度和经营业绩可充抵学分。短短一年间该校出现了3位“90后”在校生“百万富翁”，“淘宝班”第一届毕业生115人平均月收入过万。有报道称“义乌工商学院1/4的在校生进行创业，60%的人生活费自理”“阿里巴巴上市揭幕仪式上3张照片取景自义乌工商学院”，上述独特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义乌淘宝班”与义乌小商品市场之间有何深层联系？高校这一创业教育主体此时深度汇入创业教育的推进机制是什么？

六年后的2015年，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与浙江大学联合共建的“紫金众创小镇”闪亮登场，成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重要地标。该小镇采取“研发总部”的创新组织形式，依托浙江大学，发挥校企联合创新效能，打造以高端信息经济产业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平台。截至2017年，小镇已有企业3508家，国家级孵化器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1家，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03家，其中国家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50家。博士后工作站2个，市院士专家工作站5个，省、市技术研发中心48家。2016年实现总产值130亿元，税收总收入11.81亿元，吸引就业人数1.5万人。^①紫金众创小镇近三年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效益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紫金众创小镇”的组织形式与“义乌淘宝班”和浙江各类“众创空间”之间有何内在联系？“紫金众创小镇”内部集聚的创业群落互动机理是什么？除高校之外的其他创业教育主体汇入创业教育的推进机制是什么？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众多，创业氛围浓厚，业已出现了包括“义乌淘宝班”“紫金众创小镇”在内的大量创业教育的原生式典型案例。本文拟纵观浙江省创业教育二十年间（1999年—2018年）的历时发展历程，深度分析温州村、义乌淘宝班、紫金众创小镇等浙江省创业教育典型事件，探讨浙江省“汇融式创业教育”的本土发展特色，即不同主体“分时期渐次汇入”，“校·政·企”等“多主体渐进融合”。

¹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义乌淘宝班’到‘紫金众创小镇’——浙江‘汇融式创业教育’演进研究”（19NDJC02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创新驱动战略视阈下提升湾区创新极化效应的机理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浙江大湾区为例”（18YJCZH091）、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创新强省’战略视阈下提升浙江大湾区‘创新空间体’极化效应的机制路径研究”（2018QN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创业教育‘中国经验’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八所高校案例实证”（项目编号：17YJA880084）成果。

作者 严毛新，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教授、党委书记；通讯作者厉飞芹，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杭州 310012）

一、渐次汇入：浙江近二十年创业教育的演进特征

（一）多元主体渐次参与

从社会学角度看，家庭创业教育、社会创业教育、学校创业教育都是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力度和彼此间的互动形式是不同的。在浙江众多创业教育典型案例中，“义乌淘宝班”和“紫金众创小镇”是较为引入注目的两个，通过近距离观察上述两大案例可以发现，两者分别反映了浙江省在不同历史阶段，创业教育各类主体（如亲缘好友、企业、政府、高校等）不断汇入的鲜明历程。笔者认为，二十年间浙江省创业教育的演化路径明显呈现出不同主体“渐次汇入”的特点，按照主体汇入的先后顺序，可以基本划分为“家庭亲缘创业教育汇入期”“企业衍生创业教育汇入期”“公办高校创业教育汇入期”“企业、民非组织创业教育汇入期”“民办高校创业教育汇入期”“中小学创业教育汇入期”等阶段。上述各阶段具有“汇融交叉，政府参与”的特点，越往后发展，参与主体的类型越丰富，互动也越复杂。笔者认为，当前浙江省创业教育可能正处于“公办高校活跃同时企业和民非组织渐次汇入”的阶段。

1. 家庭创业教育主体汇入

“义乌淘宝班”出现在义乌而不是浙江省的其他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淘宝班”是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依托的，其表现形式是大学生直接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拿货，用于淘宝网上销售，使传统的小商品市场的销售渠道得以更新和拓展。而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大量创业者的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创业技巧的主要学习渠道显然不是学校，对他们的创业教育发挥最大作用的往往是家庭亲缘网络。

浙江自古以来就有浓郁的经商文化，即使在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民间各类试图突破禁锢的从商经营活动仍层出不穷，浙江基层政府对于此类广泛活跃于民间的从商创业行为的“宽容”态度，也明显高于国内一般水平。比如，1982 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温州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个私经济“风口浪尖”上的活跃分子，还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①。但不久之后，温州市领导就敏锐地感觉到“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于是很快进行了纠正处理。在相对宽松的创业氛围下，浙江多地以血缘亲属网络为连接的群体性创业现象蓬勃发展，例如以血缘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温州商人群体就是家庭创业教育成功的典范。

2. 高校创业教育主体汇入

和全国高校创业教育一样，浙江省的高校创业教育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但与全国很多其他地方相比，浙江地域从商文化更加浓郁，因此在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过程中，无论是高校教师的心理响应度还是学生家长群体的自主接纳度都更加积极。此外，各大高校根植于区域化产业集群网络中，与本地创业者互动频度与深度的优势非常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经济越是活跃的市县，高校创业教育的活跃程度往往越高。比如，在创业者非常活跃的温州地区，温州大学早在开展创业教育之初就将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2009 年前后分别与全球最大软件公司微软、红蜻蜓集团合办了“微软 IT 班”“红蜻蜓店经理成长班”“创业先锋班”^②。成立于 2007 年的创业园已累计孵化 120 支创业团队，目前在园的创业团队年平均营业额达 8000 万。温州大学特色的“专业创业工作室-学院创业中心-学校创业园区-社会创业平台”四级孵化机制已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示范性影响。^③地处温州的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也因“园区化产教融合”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入选“2016 年度 50 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再如，依托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工商学院从 2009 年起通过开办“淘宝班”为学生传授网店设计、营销、谈判、合同等实用技能，开设创业园，配以可供上网的教室和货物存储仓库以孵化学生创业项目。淘宝班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创业明星”，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还留在了义乌创业。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分布在沿着义乌工商学院周围一带的小区内，因而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淘宝创业带”。“义乌淘宝班”的出现是高校创业教育主体适应时代的需要，结合地域需求，适时有效汇入浙江省创业教育领域后积极作为的一个典型案例。

3. 企业创业教育主体汇入

在义乌淘宝班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众创空间，以及互联网时代的众多民间创业服务平台，例如“百度云平台”、阿里巴巴集团的“百川创业”与“创客家”、腾讯的开放平台等，呈现出社会多元创业教育主体不断汇入的趋势。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系统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浙江省共有各类孵化器 200 余家，其中国家级 59 家，国家级数量位居全国第 3；全省众创空间共计 256 家，其中国家级众创空间 80 家。256 家众创空间累计集聚大学生创业团队（企业）3472 个，留学归国创业团队（企业）409 个，科技人员创业团队（企业）1534 个，大企业高管离职创业团队（企业）557 个，连续创业团队（企业）1340 个。^⑨这些活跃的众创空间背后，是社会企业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下成为新的创业教育主体渐进汇入的生动写照。而 2015 年之后出现的“紫金众创小镇”，更是这种多类型企业深度参与创业教育实践，与浙江大学等高校、西湖区政府和其他多种社会组织深度互动融合的典型案列，在这种融合中共同培育浓厚的“科技创业”的主题性创业氛围，吸纳、培养各类创业人才成为一种创业教育新型综合体。

（二）多类型关系渐次形成

1. 家庭亲缘型创业教育：模仿跟随关系

在多元主体渐次汇入浙江省创业教育的进程中，不同主体间融合互动，由此创业市场中多类型关系渐次形成。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家庭创业教育在浙江省创业教育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出生于创业型家庭的孩子总是受到家庭创业氛围潜移默化的沉浸式影响。例如很多温州商人的子女从小在创业家庭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在离开学校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尝试与父辈及其他亲属相同、相似或关联的产业，在亲属们的言传身教中，创业成为很多人很自然的选择。^⑩在当时商品市场尚处于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基于亲缘网络创业教育衍生出大量的模仿型创业。创业教育的“施教者”与“被教者”往往从事的是同类甚至是完全同种性质的竞争行业，而且创业地点选择也时常相近或相同，由此呈现区域性的“集聚式创业”现象，全国很多地方的“温州村”是这类创业的典型代表。

2. 企业模仿裂生型创业教育：集群竞争关系

当社会创业教育开始兴起之后，大量的企业出于提升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或被动或主动地对员工进行创业知识的传授和创业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一些地区的领军型企业通过内部培养形成了一批技术骨干、营销骨干。这些骨干在各自的岗位上逐渐积累了特定行业领域所需的创业知识和技能，很可能在某种机缘下变身为创业者，而这些创业者往往选择与先前企业相同或相似的行业。但是，与之前所述家庭亲缘创业教育的“受教者”不同的是，这批社会创业教育的“受教者”所接受的创业教育更加系统、规范。因此，当他们“学以致用”时，所模仿的创业行为也更加专业、成熟。例如作为我国重要的领带产销基地，嵊州市的领带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内含了许多以不同强度构建起来的企业谱系，其中以佳友谱系最为典型。浙江佳友领呖有限公司是嵊州第一家领带企业，曾在“佳友”任职的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经过培训掌握了领带企业的运营经验和销售渠道，跳出“佳友”后独立创办领带企业，经过几代衍化由此形成了庞大的佳友谱系。^⑪

3. 高校创业教育：从输出关系到互养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浙江省各大高校开始渐次汇入创业教育。对很多高校而言，在校内开设创业课程和创业活动的初衷是响应和落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提升青年学生创业创新能力，以解决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号召。因此，在创业教育关系中，高校与青年学生之间总体体现为单向的“输出”“给予”关系，即把创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帮助其提升创业意识和技能。但在创业教育的深度推进和互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浙江高校逐渐意识到，在校教师与在校学生一样需要接受创业教育。在校师生共同参与创业教育活动，两者之间的知识传递由“单向输出”转变为“双向互养”，师生间关系的高度互融不仅能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大幅度提升了高校的创新创业嵌入度。例如浙江农林大学于 2010 年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性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战略目

标,通过搭建教学、实训、竞赛、孵化四大平台,形成了贯穿各个学院的平台生态分布。^⑧浙江大学以培养“时代高才”为核心,构建了以“IBE”(Innovation-based Entrepreneurship,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为特色的“全链条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⑨通过多年创业教育为社会输送了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了浙江创业“新四军”中的“浙大系”。2015-2017年间,浙江大学相继入选“全国首批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

4. 社会平台空间型创业教育:专业服务及互融关系

除了“企业模仿裂生型”创业教育外,社会创业教育系统中还包含另外两类主体,一类是结合创业者的现实需要,为创业者提供知识培训各类培训机构。这些机构以收取高额培训费为主要盈利模式,培训时间一般以一天到几天的短期培训为主,培训方式为教师主讲、学员分享、企业参观考察相结合。另一类社会创业教育则是以某类平台型企业运营的方式存在,具体表现为众创空间、创客空间以及各类创业孵化器,它们中大部分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和支持。这类平台型企业扶持本平台上的创业企业成长,以获取租金收入、股权投资收入、政府补贴等作为主要赢利模式。与家庭亲缘型创业教育和企业模仿裂生型创业教育不同,这两类社会创业教育的“施教者”与“受教者”更明显地是通过双向自愿选择结合在一起。同时,“施教者”的创业教育内容也更加专业、高效,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更多体现出“双向获利”的特征。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系统显示,浙江省256家众创空间2016年全年举办创新创业活动7959场,开展创业教育培训4773场,平均每天各类活动和培训多达35场,催生了一批知名品牌创业活动,如六和桥投融资路演、罗汉创学院“观潮会”、楼友会Big Demo等。^⑩

(三) 多重性网络渐次构建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网络由若干节点和连线构成,节点代表个体,节点的连线代表个体间的特定关系,^⑪因节点之间联结方式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由此构成了多重关系叠加的网络结构。在创业教育语境中,随着多元创业教育主体(节点)的渐次参与,由不同主体之间交互形成的多类型关系(连线)渐次嵌入,创业教育的网络结构也由相对单一变得错综复杂。从创业教育的参与主体视角看,网络结构主要可分为亲缘关系网络、产业集群网络、高校集群网络、众创空间网络等;而从关系属性看,网络结构又可基本分为知识网络、交易网络、竞争网络、合作网络等。上述网络在创业教育的推进过程中渐次嵌入、交叉重叠、动态演变,形成了特定阶段下立体、多维的关系网络耦合体,进而构建起符合特定情境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创业教育各主体产生剧烈“化学反应”的过程,呈现出在核心层、联接层、汇聚层、要素层的跨层次发展特点,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期汇入、形成汇融合力过程中,主体结构发生多维度多层次的改变。创业教育网络中主体性质越单一,网络属性就越简单,嵌入网络中的知识体系也相对固化与趋同,创业教育知识的溢出和共享以经验式知识为主。例如家庭关系网络、产业集群网络内的主体因亲缘、地缘在创业教育方面往往属于强联结关系,而知识网络的同质性又致使主体间的学习以借鉴式为主。适度地进行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获得社会资本可以使组织更容易获取创业资源和知识,但是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会导致组织产生创业认知偏差。^⑫高校集群网络若局限于高校主体则同样容易陷入创业教育行为趋同的困局,以开放姿态拥抱地方产业、融入地方市场的高校易吸引不同主体的汇入,从而构建相对复杂的创业教育网络。义乌淘宝班是义乌工商学院基于小商品市场优势、融入电子商务经济的结果性输出,以创业者为核心、以创业过程为联接,淘宝班汇聚了高校、市场、淘宝平台、家长等多元主体,主体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关系、交易关系、支持关系渐次汇入形成具有义乌地方特色的创业教育网络。整体而言,汇入创业教育的主体异质性越强,其知识结构差异性就越大,主体碰撞过程中会无限扩宽知识域、合作域、创新域,由此构成利于多重网络效应激发的创业教育网络。与义乌淘宝班相比,紫金众创小镇除高校外,汇入了政府、企业、民非组织等不同主体,主体间异质性大,主体间的交互方式和嵌入模式错综复杂,交易关系中新增投资、孵化等关系,高校的创业导向关系和科研驱动关系替代了原有相对薄弱的支持关系。此外,政策、场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创业要素也得到进一步保障,由此构成的复合型创业教育网络进一步衍生为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的多重价值网络。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于2014年首推特色小镇概念,截止2018年9月已相继公布四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共计135个,与强调生产功能的

产业集群相比，特色小镇集聚“产业、文化、旅游、社区”等多种功能，是多主体聚合、多要素集聚的创新空间体，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创业教育网络结构的复杂性。

表 1 浙江省创业教育四大关系类型及案例

	创业教育关系类型	关系描述	关系特点	典型代表
1	家庭亲缘型创业教育	模仿跟随关系	无偿、日常生活渗透、非专业教育、同类模仿	全国各地的“温州村” 义乌小商品市场
2	企业模仿裂生型创业教育	集群内竞争关系	无偿、岗位实践学习、非专业教育、同类模仿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谱系
3	高校创业教育	从输出关系 到互养关系	无偿、理论学习为主、专业教育、非同类模仿	义乌工商学院-义乌淘宝班 温州大学-红蜻蜓店经理成长班 浙江大学-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创业课程
4	社会平台空间型创业教育	专业服务 及互融关系	有偿或互惠、实践学习为主、专业教育、非同类模仿、 多类主体深度互融	浙江省各类众创空间 紫金众创小镇

如上所述，浙江省创业教育实践的突出经验，在于根据时代发展背景，适时用政策手段、组织保障、文化引导等方式，让各主体以恰当方式参与进去，并促使各主体发挥所长、有机融合，具有“汇融式创业教育”的本土特色。

二、需求诱致：浙江“汇融式创业教育”演进诱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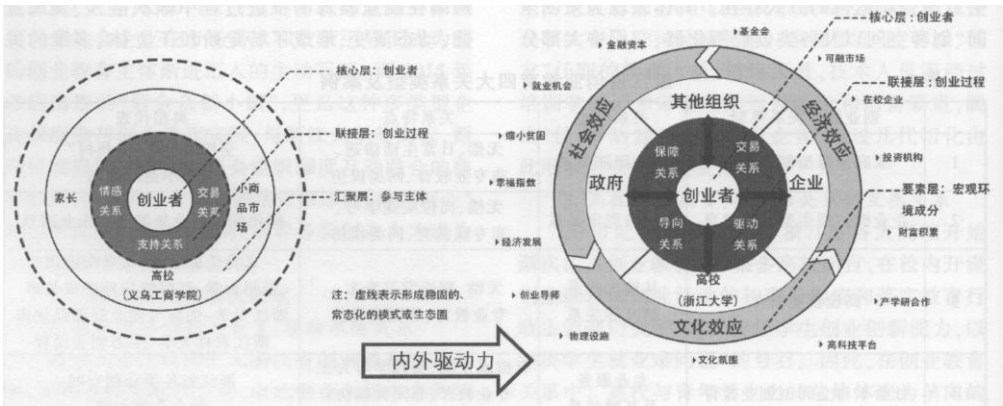


图 1 从“义务淘宝班”到“紫金众创小镇”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演进示意

（一）创业市场中创业教育要素短缺的需求诱致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新的收入流是对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业市场中，当某类创业元素较为活跃后，相关创业活动的现实和潜在收益就会日益突显，由此带来滞后性创业元素的主动补齐或者变相补齐。浙江如火如荼的创业实践活动引发多元创业教育主体的主动汇入。笔者认为，创业市场中要素短缺的需求诱致是浙江“汇融式创业教育”演进的核心机理。这种要素短缺的需求所产生的内生变量，导致非均衡力量自发的进展。因此，浙江省高校在落实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创业教育要求过程中，会主动对接市场需求，突破性地不同阶段做出大胆尝试。

2009 年“淘宝班”出现在义乌工商学院而非浙江省其他高校，因在中国互联网营销初生时代，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大量创业者并不具备网络营销知识，而传统的家庭亲缘创业教育在网络创业项目学习中往往“无能为力”，当创业市场中这一教育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诱致了毗邻的高校加快汇入，以填补空白。于是紧贴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义乌工商学院很自然地承担起了这一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基于同样的原因，多年前，温州当地企业主动与温州大学合作提升企业中管理人员的创业素质，从而开办了包括“红蜻蜓店经理成长班”在内的各类特色班。浙江大学则早在 1999 年就开办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2002 年成立未来企业家俱乐部，旨在培养潜在的商业领袖和管理精英。高校上述做法在实践中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响应，因为“跨界网络整合是全球化背景下集群企业获取能力提升源泉的关键途径”^①，与高校等各类创业教育主体深度互动，很容易成为企业拓展知识网络、实现多维边界突破的低成本举措。在社会创业教育方面，因满足创新创业的各类需求而衍生出了多种组织服务模式，例如浙江省众创空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了培训辅导型、投资驱动型、媒体驱动型、专业服务型等发展模式。其中，服务创业、创新、创造的“三创汇”每月举办两次创客与投资者的交流活动，期间用“拍砖”的方式对创业者提意见，形成了特有的“拍砖文化”。综上，创业市场中创业教育要素短缺的需求诱致性变迁，充分发挥出了个人、高校、企业与社会组织对创业教育的原始推动力作用。

（二）高校创业教育实用性强化需求诱致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历史作用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提高而不断提升的。2017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45.7%，^②正处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青年人是当今社会中最具创新意识的群体，也是最贴近时代脉搏的群体，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在大学里度过四年青春甚至更长时间的时候，他们之中有关创业问题的想法和行为就不再是其个体问题，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笔者在近几十年的高校工作实践中发现，在入学时就有明确的创业意向或者家族生意“接班”意愿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在此形势下，“如何让高校教授的知识更实用”这一命题，在很多高校的创业教育语境下衍生为“高校教授学生的创业知识和技能也应更实用”。显然，由于我国高校治理体系相对封闭，高校与市场主体的接触相对较少，高校内具有创业经历的师资也较为匮乏，而在世纪之交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原行业部门所属的行业办高校大部分都被纳入教育部或省市区教育机关主管范围，改制之后的行业办高校打破了依托行业办学的传统模式，却并未及时形成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人才与技术供需体系，高校与行业之间因失去相互依托而更为疏离，^③由此，高校承担的创业教育任务就变得非常困难。

笔者认为，浙江省在破解这一难题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做法与成效，其重要推动力在于浙江省高校系统实用性难题破解的需求诱致。2017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8.2%，^④这意味着适龄青年每百人中就有 58 人在读大学。与国内诸多省份相比，浙江省民营经济相对发达，除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外，国企员工“铁饭碗”的数量少。因此，当大学生入学率日益提高，大学生“天之骄子”光环渐渐开始褪去的时候，毕业之后的去向和出路问题就愈发明显地摆在浙江百姓面前。受高校实用性欠缺难题破解的需求诱致，在内生变量影响下，浙江高校不自觉地更加愿意与各种可能的外部创业教育主体展开合作，然后沿着各自特色的非均衡的发展路径前进，从而形成一种持久性的外部推动力，使得源自高校外部或者学生群体中的变革性需求高效地转化为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措施并得以迅速扩展。笔者认为，无论是义乌工商学院当年顶住各方争议在校内开办“淘宝班”，还是浙江大学在紫金众创小镇中大胆推出的很多具有创新性的创业教育做法，其内在的深层机理都是源于高校实用性难题破解的需求诱致所产生的高校与外部主体主动合作的持久性推力。通过对国内部分省份高校的对比性访谈和问卷调查，笔者总结了如下概要结论：· 相对而言，浙江省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过程中更加重视对大量群体的普适性辅导而非重点创业者人群的集中性投入；对于活跃在学生中的校园“微创业”行为更具包容度和支持度；通过创业实践获得盈利以维持其日常生活费的学生人数比例相对较高；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主动与校外人士展开合作的意愿和执行力也相对较强。而从省内视阈看，各地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过程中的地域差异度也非常明显，例如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地高校的创业教育实践清晰地呈现出其各自深度扎根于区域产业经济的特征。

浙江省高校在创业教育的务实管用性方面虽已取得阶段成效，但也存在过于关注比赛获奖等外在显性的指标和项目的倾向，使创业教育易陷入“盆景化”“指标化”误区。首先，在创业大赛中，由于高校普遍对获得省级、国家级荣誉的学生及指导老师

的奖励过大，导致很多高校出现为获奖而参赛的倾向，创业大赛的过程和目的明显异化。其次，在创业园建设方面，由于存在过度与考核加分指标和专项拨款挂钩的情况，使得部分大学生创业园徒有其名，实效性作用有限。同时，由于教育行政部门过于看重对创业学生人数比例的统计和宣传，致使部分高校偏向于从增加统计数字的角度促进大学生创业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创业的“低层次性”和“弱持久性”。此外，部分高校对于“吸引眼球”性质的学生创业项目关注过多、投入过大，常常给予全程式的指导以助其持久运行。相比而言，在学生创业意识的群体性培育和特色创业教育项目实力的全方位提升方面则投入不足，资源投入的相对失衡使得很多高校的创业教育陷于低效、重复、非专业困境，在大量的借鉴式学习过后容易出现高度趋同、“多校一面”的现象。

（三）行政部门多重复合性互动的需求诱致

在推进创业教育进程中，各级政府担负着间接主体的角色，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直接主体获取必要的制度安排，推动创业教育制度供给积极变迁，实现创业教育的良性发展。由于直接主体的行为容易带有自发性、趋利性的特点，甚至出现搭便车、外部效应以及寻租等现象，从而不利于创业教育制度变迁的良性发展，此时需要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进行适当的制度调适。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发挥，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使命压力巨大的现实背景下，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需求明显存在差异化、多变化、动态化等问题，而各类需求的多重复合互动对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创业教育直接主体的行为会产生深刻影响。

在各类创业教育政策的供给中，笔者认为共青团中央、国家教育部和各地市县出台的政策相对而言最为有力。20世纪90年代末，共青团中央首先吹响了高校创业教育的号角。1999年，首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开始举办。随后，高校创业教育进入教育行政部门引导下的多元探索阶段，2002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等9所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工作；2008年教育部通过“质量工程”项目，又立项建设了32个创新与创业教育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自2010年开始高校创业教育步入全面推进阶段，教育部相继颁发了《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等重要文件以推动创业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发展，2012年创业教育课程被列为高校必修课。201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也标志着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迈入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深入推进阶段，^①2017年1月与6月教育部相继公布了首批99所和第二批101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的认定工作。笔者认为，解决高校连年扩招带来的就业难问题是推动教育部持续多年开展创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世界各国的实践均已证明，创业活动具有解决创业者自身就业以及创造社会就业的双重功效。高校创业教育的教育对象在指向性上非常明确，最初为在校大学生，随后扩展到一定年限范围内的毕业生，部分高校已逐渐扩展到本校教师，还有少部分高校尝试面向社会上的创业者。

在推进创业教育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另一类政府主体是基层市县的地方政府，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市县。由于地方政府在长期实践中已深刻体会到鼓励民众创业对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增加税收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当国家部委对创业活动和创业教育推出明确政策之后，他们会自然而然做出积极响应，推出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并将创业教育与引导本地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工作深度结合。在此过程中，浙江省作为一个创业民风坚实、创业市场发育完善的省份，其响应的热度明显更高。例如杭州自2008年就开始实施《杭州市大学生创业三年行动计划》，至今已累计实施四轮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配合最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2017年-2019年），《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助资金实施办法》于2018年5月正式发布，实施办法详细解释了获得无偿资助和扶优资助的政策细则。此外，绍兴市于2011年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实施意见》，201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快培育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温州市于2016年发布《温州市区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实施细则》，2018年公布“温州创十条”^②全面推行创业就业福利。整体而言，浙江省各市县在扶持创新创业方面不遗余力，充分体现了对浙江省“八八战略”与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积极响应。

随着国家各部委关于支持创业、推进创业教育的各项政策持续推出，浙江省各级政府分别从各自实际推出相应具体政策后，多重复合性需求导向对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创业教育直接主体很自然地发挥出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复合性的制度供给促使

浙江省各类创业教育直接主体积极作为，化解创业教育现实困境，从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现行成本，获得了现实或潜在的收益。各主体在复杂互动关系中实现了一种共赢共生的合力效应。例如义乌淘宝班在不断孵化淘宝电商的同时，也反哺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义乌工商学院也因其出色的创业教育被评为“创业型大学”试点院校。再如，紫金众创小镇在为创业企业提供平台的同时，还促进了浙江大学科研成果的积极转化，当地政府也因此交出了产值、税收、就业方面的亮眼成绩。

三、融合共振：“汇融式创业教育”演进展望

（一）“去中心”主体架构的针对性培育

回首中国创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心化特征一直非常显著。在各个阶段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存在以某一主体为核心，其他主体为节点，中心决定节点、节点依赖中心的情况。例如在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家庭亲缘创业教育一直占据着中国创业教育的中心地位。在该阶段，相当比例的创业者受亲戚朋友影响走上创业之路，这些创业者或“自行摸索”“无师自通”，或“跟随学习”“模仿而为”，创业群体则常常表现为“集聚而为”“相互帮衬”。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后至本世纪 00 年代末的很长时间里，随着一大批中大型生产或服务型民营企业的兴起，家庭亲缘网络之外的社会创业教育开始在创业教育中心化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该阶段，很多民营企业中的优秀骨干将自己在岗位上的“实践工作心得”，直接转化为个体“创业学习心得”，把握机会、勇敢学习、离开企业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这些创业者通过“深度模仿”“局部优化”，与原企业形成一种既“争夺资源”又“有序合作”的关系，客观上共同推动了本地区产业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浙江省部分特色小镇正是在家庭亲缘创业教育、社会创业教育共同占据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从本世纪开始，高校创业教育的作用开始初显，部分高校成为促进本地区创业的有力主体逐渐发挥出独特价值。比如，义乌工商学院“淘宝班”对互联网创业模式的探索式贡献，温州大学等高校校内创业园对传播创业理念和知识的引导式贡献，浙江大学对促进项目与资本互融以实现科技创新的突破式贡献。整体而言，我国创业教育发展历程中“政府推动型”特征较为明显^②，在政策强势导引的背景下，高校创业教育与社会对接深度不足，浙江高校虽已取得显著成绩，但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整体作用还十分有限。随着创业教育的持续深化，更多主体汇入并形成多元趋动、并行发力的格局，其中民非组织的力量不容忽视。民非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校友会等因其组织特性，组织成员之间往往存在以信任为强联结的情感纽带，益于创业氛围的营造。另一方面，民非组织也是信息中心，汇集各类产业信息、企业信息等，利于促进创业要素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利于创业机会的捕捉。

如上所述，创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创业教育主体“中心”的迁移过程，“家庭中心-社会企业中心-高校中心-民非组织中心”的演进脉络根植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现实情况，随着网络服务形态的多元化，创业教育网络结构中的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每个节点都可能成为一个“小中心”。从“去中心化”的演进趋势看，创业教育将经历从单一中心到多中心再到平台化的发展过程，各主体在创业教育网络中的分工将愈发专业。

（二）“并行式”协同结构的互通性完善

在以往的创业教育历程中，囿于时空限制，各类主体汇入创业教育时存在先后时滞，嵌入创业教育网络时也存在程度差异，同时创业信息孤岛问题较为常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创业教育主体存在的网络空间呈现扁平化趋势，这也意味着主体之间的接触渠道不断缩短，要素之间的耦合机率大幅提升，传统“递进式、时序式”的创业教育操作被一再打破，由此“汇融式”创业教育在网络结构上呈现“并行式”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主体并行，即创业教育主体汇入的速度加快，同一时期存在多个主体中心的可能，家庭创业教育、高校创业教育、社会企业创业教育等并行发展。例如，2017 年 10 月，浙江大学牵手腾讯实施战略合作，共建浙大紫金众创小镇·腾讯云基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众创空间，^③高校主体和社会企业主体实现并行与互融。二是程序并行，即创业项目在实施步骤上实现多环节“并行”展开的可能，例如技术研发与项目融资可同时进行，由此优化了项目推进的流程，降低因等待产生的时间成本。

兼具“主体并行”与“程序并行”的创业教育网络结构客观上要求存在异质性的多元主体和多个项目实现目标协同，这就需要加强主体间的信息互通，丰富沟通场景，创新沟通媒介。自组织理论指出，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是自组织过程的基础，系统内各参量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作用是系统产生新结构的直接根源。当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走向稳定有序的状态时，创业教育主体以自组织的常态化形式存在，创业团队也更多地表现为自组织团队，团队成员的组合与退出机制相对灵活，主体间的沟通方式常以自发、短频、直接、高效为主导价值取向，例如众创空间内各种自发形成的项目路演。在紫金众创小镇项目路演中心，创业创新沙龙因需而办，既为各位创业者提供了政策解读、经验分享、项目展示的平台，也为创业者嵌入紫金众创网络提供了着力点。从演进趋势看，“并行式”结构应以扁平化机构和自组织团队为基础，以共创、共享、共治为核心理念，以涨落与突变的互变关系为发展动力，建立健全竞争与协同的运行机制。^⑨从沟通媒介看，需要推动新技术、新范式在网络群体互动中的高频应用，例如区块链技术因其“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等特征，与“汇融式创业教育”的演进趋势不谋而合，加快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创业教育中的深度运用是新时代创业教育的内在要求。

（三）“共享型”服务平台的开放性建设

笔者认为，在今后二十年中，其他主体（如民办高校、中小学、民非组织等）将“渐次深度汇入”中国创业教育领域，并发挥重大作用。在此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出不同创业教育主体各自的活力，从家庭、学校、社会多个角度全面影响不同年龄阶段公众的创业意识，使不同个体可以根据内在需要更为方便地获取创业知识和技能，创业教育服务公共平台的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共享型”创业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应当与现有的区域性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融合。由于集群企业知识网络地理边界拓展有助于“获取、吸收地理边界外部网络内的异质性、互补性知识以实现创新能力跃迁”^⑩，因此，“共享型”创业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对于集群企业中创业者成长的持续贡献度将会进一步提升。从主体分工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看，创业教育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有利于实现“整体趋同型创业教育”向“差异化型创业教育”的积极转向，利于有效解决如何鼓励引导民非组织汇入、如何实现各类创业孵化器与高校深度互动融合、如何逐步将中小学创业教育纳入创业教育体系、如何从制度层面构建行政机构与各类其他组织在创业教育中的新型互动关系等多种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有本土特色的开放互动式内涵发展方案。

目前，创业教育服务公共平台已渐有雏形，但现有公共平台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共性资源的互通机制，因平台呈分散式碎片化存在，导致高校需要创业教育实务导师时缺乏供给保障，企业需要理论指导时缺乏有效对接。二是缺乏核心资源的共享机制，例如在当前制度下，社会公民的个体创新思想无法在国家公共财政投入的实验室内得以尝试和实现。因此，建立公办院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的开放性使用制度，对鼓励创新创业将产生重大意义。三是缺乏支撑创业项目的高效融资机制，当前各类融资诈骗案件的高发使公众的投资选择更为谨慎，由此影响了创业项目资金的持续输入。笔者认为，从培育创新创业型社会角度来看，应当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鼓励社会公众投资各种新创企业或新创项目的机制。通过社会融资渠道的拓宽，创业者更容易以较低门槛获得资金支持，个体投资者也因“聚少成多”实现投资风险最小化。从社会效益看，更多公众借投资创业项目间接参与到创业队伍中，这也意味着全社会创业意识的大幅度提升。鉴于上述问题，“汇融式创业教育”亟待开放型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在推动资源共享的同时保障创业教育服务的精准供给。

注释：

① 资料来源：紫金小镇官网，<https://www.tronker.com/work/tronker/hatch/purple-town.html>。

② 八大王事件：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③ 翁浩、程婧：《高校“特种部队”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以温州大学为例》，《新一代》2011年第3期。

④ 满德利：《创业与专业深度融合，温州大学创业教育独树一帜》，参见大众网：

http://edu.dzwww.com/dzjyxw/redi-an/201611/120161130_15218816.html, 2016-11-30.

⑤ 资料来源：浙江孵化器在线，<http://www.zjfhq.com/portal/home>.

⑥ 严毛新：《从社会创业生态系统角度看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

⑦ 参见杨轶清《企业家能力来源及其生成机制——基于浙商“低学历高效率”创业现象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⑧ 王康、卢晶、李锦威、马小辉：《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化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农林大学的实践探索》，《创新与创业教育》2017年第5期。

⑨ 林伟连、吴伟：《以“IBE”为特色的全链条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浙江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实践》，《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⑩ 资料来源：浙江孵化器在线，<http://www.zjfhq.com/portal/home>.

⑪ 蒋瑛、蒋海曦：《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⑫ 杨震宁、李东红、范黎波：《身陷“盘丝洞”：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影响了创业过程吗？》，《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

⑬ 徐蕾、魏江：《集群企业跨边界网络整合与二元创新能力共演——1989-2011年的纵向案例研究》，《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7期。

⑭ 资料来源：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⑮ 降轶芳：《地方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困境与出路》，《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9期。

⑯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2017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⑰ 王占仁：《中国创业教育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⑱ “2018温州创十条”：办好2018创博会、打造高校毕业生创业工坊、提升家政服务水平、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力度、派送创业就业大礼包、开展创业大赛、开展创业巡回宣讲、营造创业文化氛围、开展创业课题研究、强化失业保险支出。

⑲ 严毛新：《政府推动型创业教育：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历程及成因》，《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3期。

⑳ 资料来源：浙大牵手腾讯云，在紫金众创小镇打造了个超酷的众创空间！<http://www.sohu.com/a/201260435.166896>

㉑ 陈建录、李瀑菲：《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的高职创业教育管理平台构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年第14期。

㉒ 徐蕾、魏江：《网络地理边界拓展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路径依赖的解释视角》，《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5期。